

知用：格物求知 求理致用

大洋新闻 时间：2008-04-27 来源：广州日报 作者：梁婵、金叶

策划：赵洁 撰文：梁婵 金叶 摄影：王维宣

这是一间独特的中学。80多年前，一群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，胸怀救国梦想，组织进步学社，在城西的旧屋，燃点兴办新式中学的星星之火，并在百灵路发展壮大，蜚声省港澳。

这也是一间颇具传奇色彩的学校。70多年前，鲁迅先生南下广州，专程来到这所学校，勉励这里的学子，“用眼睛去读世间这一本活书”。那振聋发聩的声音，穿越时空，犹在耳边。

此外，我国近代史上不少大名鼎鼎的名人，都曾在这所学校留下足迹：茅盾、夏衍、蔡楚生、欧阳予倩、欧阳山、廖承志……

它，便是知用中学。至今无法想象，这间看似普通的中学，何以吸引如此多的名人纷至沓来？

也许，当它的创建者们，怀着“格物求知，穷理致用”的信念，执著地坚持教育救国梦想时，已注定了这所学校不平凡的历程。

拭去历史烟尘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这间学校身上，印刻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轨迹。

知用学社教育救国

上世纪初，广州的中学大部分由外国教会垄断。知用中学是广州早期由中国人创办的私立中学之一，追溯它的历史，不得不从知用学社说起。

办中国人的学校

1922年11月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（即中山大学前身）一批进步毕业生陈克文、潘学增、陈贤德、褐参化、余心一、熊润桐等12人，怀着救国梦想，自发成立一个组织：知用学社。到1928年，陆续加入为社员的还有张瑞权、毕磊、唐富言、陈寂、谢申、吴三立、胡金昌、刘冕群等数十人。

这是一个精英会聚的团体。余心一、熊润桐是才华横溢的诗人，他们和佟绍弼、曾希明、李履庵一起有“南国新五子”之称。梅雨天，是留日归来的中国早期水彩画家。张兆驷，有“广州数学四大天王”之称。此外，不少社员后来成为国内外闻名的专家、学者。

不难想象，这群博学而活跃的年轻人，在思想的交流中，会撞击出怎样闪亮的火花。他们订下学社的宗旨：“先归纳以求知，复演绎以致用，求知致用双方并重”，平时注重学术研究，

“只译述以为务，著文章以自娱，凡公私珍藏，钞刊秘册，七略四部，九流六书，亦有搜罗，共深研究”。

然而，知用学社的青年们并不满足于此。用实际行动救国，是萦绕在他们心中强烈的愿望。他们商议：在教会学校占多数的情况下，办中国人自己的中学，以“格物求知，穷理致用”为校训，“求革命之知，致革命之用”。

1924年9月12日，社友们向当时广东大学（即现在中山大学）校长邹鲁，租借文明路的三间课室开办夏令馆，招收学生100多人，并以开班所得余款，用作建校的费用，租下纸行街（即现在纸行路）90号房屋为校舍。

房屋虽简陋，但知用学社青年教育救国的梦想，却徐徐拉开了帷幕。

率先试行新学制

作为一间私立中学，开办初期，知用中学经费捉襟见肘，所用的教具，大多是从广东大学借用。刚开办时，仅招收初一年级两个班，学生80余人。教职员多属义务职，只给少量的交通费，而创办人就枵腹从公。

在体制上，知用中学成立校董会，校长由校董会公选。知用中学第一任校长是唐富言。其后，张瑞权被选为校长，开始了长达 31 年的校长生涯。

张瑞权聘请教职员，没有门户之见，不论信仰、地域、性别、出身，只求团结合作，致力教育事业，知用中学教师队伍空前壮大。1926 年起，教学质量逐渐提高，学生人数逐年增加，声名鹊起。

旧时学制，是中学四年，知用中学率先采用“六三三”制，即初高中各三年，这是当时广东第一间试行新学制的学校。那时，全国大学实行预科学制，知用中学在没有高中班之前，兼办升大学预备班，每年开办两班，学生约 80 人~100 人。在省内外报考大学的学生，凡持有知用中学升大班文凭的，就享有直接报考本科的资格。

贫苦学生免收学费

随着求学者日渐增多，1926 年，除原有纸行街，知用中学又在诗书街租房屋为校舍。由于校舍过于分散，老师、家长筹集建校基金，以低价购得百灵路一大块菜地，兴建新校舍。到 1936 年，陆续建起求知堂、致用堂、图书馆、科学馆等数栋洋楼，气势不凡，是当时私立中学中较大规模的一间。

迁新校舍后，求学的人更加多了。至 1932 年，知用中学初高中共有 25 个班，学生有 1380 多名。它的办学质量在广州中学中更是首屈一指，蜚声省港两地。有一年高考，榜首前 5 名中就有 4 名是知用中学的学生。

为维持学校的运作，知用中学要收学费，但由于营利从来不是目的，因此学费比教会学校要低。对一些贫苦的学生，则酌情免收学费。至于学期考试，成绩名列第一而操行乙等以上的学 生，全免学费，第二名免学费一半，第三名免学费的三分之一。

鲁迅高风垂范后世

知用中学深厚的历史积淀，很大一部分与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有关——鲁迅。1927 年，鲁迅南下广州，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他先后应邀到岭南大学、黄埔军校及香港等地发表演讲。知用中学是其中的一站，也是广州中学中唯一的一间。

中学演讲

鲁迅在知用中学发表演讲，他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：“十六日，晴……至太平分馆午餐。午后往知用中学讲演一时半，广平翻译。”

鲁迅为什么会到知用中学与师生进行交流？原来，他与知用中学的两位创始人颇有渊源。

2007 年 1 月 18 日，鲁迅抵达广州。当时知用中学英文教员、中山大学学生毕磊代表中共与鲁迅联系。

而直接促成鲁迅演讲的，是知用国文教员禤参化。他当时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兼课，多次去信诚邀鲁迅到知用中学演讲。1927 年 7 月 16 日，鲁迅在许广平的陪同下，来到知用中学慷慨陈词，发表了著名的演讲——《读书杂谈》。

勉励师生

鲁迅勉励知用的师生：“用自己的眼睛，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”，“读书必须与现实社会接触，使所读的书活起来”。讲演十分精彩，其内容被收入《而已集》，流传至今。

当时，知用中学一名叫何春才的学生，曾与鲁迅结下真挚友谊，多年以后他回忆此次演讲，仍十分动情：“……他（指鲁迅）是针对时弊而发表他对读书的意见的。他旁征博引，材料丰富，说话生动，比喻确切，讲者畅所欲言，深入浅出，听者津津有味，深受教育。”

先生高风，垂范后世。如今，在知用中学幽静的校园里，鲁迅先生的塑像巍然矗立。纵然时光流逝，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巨匠，活在一代又一代的知用师生心中。

茅盾与知用

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知用中学不仅以优良的办学闻名，而且由于其办学思想的进步倾向，在民族危机日渐深重的形势下，不少文化名人先后应邀到知用中学演讲。

1930年5月17日，我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，到知用中学作题为《怎样完成戏剧运动》的演讲，引导知用师生把演戏视为“文化运动”，要在戏剧里把人民大众受压迫和受苦难的心声及情况呼喊出来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国民政府节节败退，不到一个月，平津相继失守，淞沪吃紧，大批文化人士南下广州，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。茅盾是其中的一个。

他于1938年抵达广州，2月25日，应作家欧阳山之约，前往知用中学作演讲，剧作家夏衍、新闻学家萨空了，也陪同出席了演讲会。茅盾的讲话题目是《旧瓶装新酒》，大意是以“旧瓶”，即诗歌、曲艺、戏剧等各种传统文艺形式，装上“新酒”内容，即表达抗日救亡和民众的呼声等等。

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。据亲身经历此次演讲的师生回忆：当天下午，知用中学求知堂四楼礼堂，挤满了校内外的观众，连过道和室外平台，都密密麻麻站满了人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
1938年2月，廖承志，也来到广州，与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广泛接触，在知用中学礼堂，作了《一切服从于抗战》的演讲，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形势，还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他的讲话全文在1938年2月5日《救亡日报》上公开发表之后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，深深鼓舞民众的斗志。

风雨飘摇成长路

抗日战争爆发前，知用学社成员齐心协力，苦心经营，使这所私立学校享誉海内外。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具有民主革命进步思想的知用中学师生，被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，数次卷入斗争风暴，濒临停办境地。知用中学师生用行动书写了广州教育史上不屈的一页。

与“士的党”斗争

1927年4月，蒋介石发动“4·15”反革命政变，广州实施戒严，反动当局缉捕共产党员及有关人士。

当时，有一个反动组织叫“士的党”，常模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“棒喝团”，用“士的”（手杖的英文译音）殴打进步学生，捣乱群众集会。

“士的党”一方面敌视知用中学师生，另一方面欲解散这间中学。一些师生被捕，甚至有学生在狱中病死，这激起全校师生和社会有识之士的义愤。

师生们积极游走，又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持，最终得以重开知用中学。

传播进步思想

知用中学的老师，本就是一群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。在他们的熏陶下，这里的学生大多具有进步思想。

今年91岁的地理学家钟功甫，1931年入读知用中学，1937年毕业。据他回忆，当年知用中学里的活跃分子，与中山大学的进步青年有着密切联系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们时常在现在的省博物馆前，组织抗日救亡演讲活动。

“那时，每逢演讲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很多，有的家长带着小孩过来观看。知用和中大的进步学生，在台上发表演讲，极具感染力，现场时常响起热烈的掌声。”钟功甫说。

钟功甫那时班上有四五十人，后来至少有十多人走上抗日道路。同学之间经常谈论抗日人物、革命事迹等，私底下传看有关抗战等“禁书”。

知用中学师生还积极投身各种爱国运动。1936年2月，广州相继举行包括全市大中学生在内的“二·二六”抗日救亡大游行，知用中学师生全体停课，参加游行示威，是当时游行队伍的骨干之一。

（註：以上文章登于 08-4-27 廣州日報）